

张一兵 主编 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导自选集

MAKESI ZHUYI ZHAXUE BODAO ZIXUANJI

张一兵集

实践塑型与

SHIJIAN SUXING YU SHEHUI LISHI GOUJING

社会历史构境

ZHANGYIBING

张一兵 著

自
選
集

江苏人民出版社

张一兵 主编 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导自选集

MAKESI ZHUYI ZHAXUE BODAO ZIXUANJI

张一兵集

实践塑型与

SHIJIAN SUXING YU SHEHUI LISHI GOUJING

社会历史构境

张一兵 著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图书馆
总号
书号
B0-0 260 1-1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



图书馆 0296073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践塑型与社会历史构境:张一兵集/张一兵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3
(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导自选集)
ISBN 978-7-214-09219-9

I. ①实… II. ①张…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文集
②海德格尔, M. (1889~1976)—哲学思想—文集 IV.
①B0-0②B516.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1718 号

书 名 实践塑型与社会历史构境·张一兵集

著 者 张一兵

责任编辑 戴亦梁

责任校对 王 溪

装帧设计 许文菲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毫米×1304毫米 1/32

印 张 11.125 插页 1

字 数 294千字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9219-9

定 价 30.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哲学世界的前行者（代序）

——专访南京大学张异宾教授

本报记者：杨涛 张文聪 张乐 范文丽

研究生报：张老师，我们发现您在出版著作时通常会使用“张一兵”这个名字，而不是您的本名，能给我们讲讲关于这个名字的故事吗？

张老师：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主要是因为我那山东的老父亲思想比较传统，两代单传的他非常希望家里有一个男孩，所以，在有了四个女儿之后，父亲对于我的到来显然十分兴奋，称之为“奇异的宾客”，这就是我名字中的“异宾”。我上小学的时候，受父母的影响喜欢用繁体字，因此“异宾”也就常常写成了“異賓”，但是同学们觉得我这个名字过于复杂难写，因此不断帮着简化，结果越写越简单。到了“文革”时期，同学们都比较喜欢用“一兵”这个名字。后来，上大学和工作之后，慢慢就变成了身份证上是原名，出版著作发表文章都使用“一兵”这个笔名。其中，并没有什么很深刻的含义。

研究生报：我们知道张老师平时很喜欢听音乐、看电影，您能给大家讲讲这些业余爱好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吗？

张老师：1993年，我从南京市回到南大哲学系成为一名老师，可以说那时候是我最幸福、最自由的时期，我的教学、科研和业余爱好可以安排得很好。但是1996年，我被选为哲学系主任，再往后又到学校工作，繁重的行政工作以及教学科研任务使业余爱好被压到了很低的限度。但

尽管如此,我也会在一段时间里尽可能保证一个集中性的连接。比如看国外的影视片,对我来说,一方面是为了放松性的调节,另一方面可以由此接触不同的文化情境。因为我们并不生活在欧洲、日本或者其他文化当中,尽管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有戏剧性的夸张,但它还是可以比较真实地反映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现状。所以,当我在教学中想把一个很复杂的学术概念表达出来时,就会使用这些文学影视作品的叙事,它们也就成为了我学术传递的一种感性工具。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方面,也正是我想强调的,所有的学问,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都不是纯粹的概念和书本上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内居于生活本身。我读研究生时的方向是哲学原理,它涉及的面很宽。正因为如此,毕业以后我阅读了大量非专业的书籍,其中就包括艺术、电影和诗歌方面的书。其实,我非常喜欢听音乐,但现在除了上下班骑自行车的时候能有半个小时听一听,其他几乎没有任何时间。这真令人伤心。

其实,对于老师来讲,最快乐的有两件事,一是能够看到自己喜欢的书,另一个是能够找到自己满意的学生。好书是使你能够与新思想碰撞的通道,它会让你保持一种与学术大师的对话和交流;而好的学生则是我们永不老去和传承精神生命的重要依存。

研究生报:张老师,通常大家感觉哲学是一门很高深的学科,它有太多的专业术语,我们这些门外汉通常很难理解,请问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大家像热爱读小说那样热爱哲学呢?

张老师: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作一个比较。比如说在今天的巴黎大街上,如果有一个老太太听说你是学哲学的,她会非常激动地与你交谈。在欧洲许多大街上的开放式的咖啡座里,人们时常谈论的主题会是哲学、神学和艺术。在欧洲的上流社会里,富裕家庭的孩子首选的专业很可能是音乐、艺术、神学和哲学。要知道,这些东西既不能变出面包,也不能变来金钱,可是它们却关系人的存在本质和内在精神生活。其实,当一个社会的富足达到了一定程度时,人们就不会总是去选一个能在将来挣更多钱的专业,而是会选择最能与他的生存个性相关,是他喜

欢并能使一个人的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的专业。比如,之所以许多人选择非功利性的艺术,主要是因为艺术最能表现一个人的内在个性,它是独一无二的精神性存在方式。我们知道,一个大师的艺术作品,会以罗丹、达利的名字永载人类的文化史,永远是艺术殿堂的瑰宝,相反,金钱却是“无名”的,你可以一时占有,但永远也带不走。对于诗歌、音乐、电影、艺术、神学、哲学等,你每贡献一点东西,那么你的名字就是与历史永存的。我觉得,中国再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也将会有一个非常富足的时代,相信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思考的问题将不再只是吃喝穿住,而会更多地思考生存的意义、历史的本质、社会的正义等哲学性和神性的问题。到那时候,哲学会是一种内在的需要。虽然哲学不是一个通用性的学科,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研究的,但是它的普及却是一个历史性的社会问题。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哲学教学把自身抽象化和神秘化了。说到今天的西方哲学,就不是所有东西都那么难懂,因为它有许多中间的话语过渡带。比如说我经常提到的《苏菲的世界》这本书,它是北欧的一本通俗的中学哲学史教科书,其主要内容就是故事,而这些故事当中又包含了很深刻的哲学道理。在欧洲,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几乎所有的大学哲学老师第一份工作都是中学哲学教师,而且在中学,所有孩子最喜欢的课程之一就是哲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哲学是开智的,它会使你在学习其他专业知识时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创造性的思考结构。我们今天的哲学教学,最缺少的就是这样从一个晦涩文本到生活本身的链接。当然,对于喜欢哲学和打算读一些哲学的同学,我认为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桥梁,就是通过哲学史、思想史来进入一个学科,所以,我建议大家读一些欧洲的思想史或者中国和东方的思想史,因为哲学表现为一个历史连贯的解决问题的过程,了解每个时代不同的哲学家的不同的问题,这样你就会有一个全景性的思想建构。

研究生报: 张老师,我们知道您一直十分重视文本解读,而《回到马克思》和《回到列宁》是您的两部代表性著作,能向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两本书的写作背景以及您最近的研究情况吗?

张老师: 我是1977年进入南大学习的,到现在已经32年了。我们这代人一进学校就赶上思想大解放,所以视野比较开放。毕业之后,我花费了很长时间进行理论积累,到了90年代,我写了两本书,一本《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本《回到马克思》。当时写这本《回到马克思》最重要的初衷,就是要与前苏联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意识形态构架进行抗争,使这个领域的研究能够从教条主义当中摆脱出来。我希望,我们这些黑头发黄皮肤的人能够用自己的眼睛去读马克思的原著,而不是通过别人。以至于《回到马克思》一书第一版的封面我专门选了黄颜色的底色和黑颜色的标题。2000年,我带领的团队重新回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中,这里面包括我们翻译的一批书,我们自己也写了一批书,其中包括我个人的九本专著和一本教材。到了2007年,我又写了《回到列宁》,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就是构境理论。我认为,作为一个原创性的学者,一生当中不能完全重复别人的东西或者仅仅去研读别人的东西,作为哲学家,你自己的思想是最重要的。今年我还要出版一本新书《反鲍德里亚》,另外准备开始研究日本的广松哲学。说到我们的团队,今年也会有许多著作出版,比如将近270多万字具有首创性的补白式六卷本巨著《资本主义理解史》,这也是我校985二期国家创新平台重大课题的成果。此外,今年还会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本《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同时,我们还将继续组织翻译一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研究生报: 在张教授的新著《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中,您提出了与斯洛文尼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齐泽克同样的口号——“回到列宁”,您可否就两者间的相同或相异作一简单解释?

张老师: 这两者非常不一样,我的“回到列宁”是指原初性地研究列

宁的哲学思想,是从学术上及逻辑上去推进,主要是为了推翻前苏东左的教条主义下关于列宁哲学研究的旧构架。而齐泽克实际上是一个激进左派,他回到的是政治上的列宁,2000年他专门开了一个列宁思想的讨论会,但他主要讲的是政治斗争和革命,我在《回到列宁》的注释中就指出过这一不同。我的“回到列宁”主要还是学理层面上的。

研究生报:如果你们关注的焦点不一样,那么你们之间的对话性不会减弱吗?

张老师:不会的。齐泽克也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性著作,我们在2007年请他来南大做学术交流时,他就主要讲拉康和马克思的关系、拉康的文化解读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研究。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阻碍。当然,现在整个欧洲左派非常感兴趣的主要是拉美的社会主义,最近我们接触到的不论英国的还是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对此特别兴奋。齐泽克也是这样,他本身也有学术圈子,如阿兰·巴迪欧、朗西埃、阿甘本等一些欧洲的左派知识分子,他们会经常开会,但主要还是关心当代资本主义统治及其抗拒问题。

研究生报:张教授是国内少数关注拉康和阿尔都塞的学者之一,是什么使您对他们如此感兴趣?他们的理论对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有什么启发和意义?

张老师:实际上,阿尔都塞本身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研究他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并没有什么外部因素的驱使。做拉康倒是被迫的,我并没有打算去研究拉康,就是在法国,他的书也是公认的很难读懂。其实,在研究阿尔都塞时我已经遭遇了拉康,因为他在1969年以后直接影响了阿尔都塞,后者后来很有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实际上就是在拉康思想的支配下写出来的。尽管当时我知道这条线索,但是由于拉康的书实在太难读懂,所以我在做完必要的思想史线索梳理之后就放弃了。但是当我开始研究齐泽克时,拉康却成了绕不过去的逻辑前提。齐泽克是第一个把拉康运用到马克思研究中的,而且他的成名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就是这类重要成果。可

是,当我拿到《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时,看了很多遍都不知道它在说什么,当时简直沮丧极了。我经常在课堂上说,这本书读到第四遍才知道它在讲什么,而且它的第一部分恰恰讨论的是我十分熟悉的马克思在经济学视域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迫使我不得不把手上所有的工作放下来,花两年时间去读拉康,而我又不懂法文,拉康的书只有利用一些英文译本一点一点弄,最后写成的东西(《不可能的存在之真》)也不是十分的专业。不过,我还是认为阿尔都塞和拉康的思想研究对于我们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甚至是整个思想文化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无论是在个人自我和主体性的内在建构以及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话语布展和控制方面,拉康和阿尔都塞都作出了西方学术界目前为止最有深度的分析和思考,这对于我们对正在发生巨大社会转型和跃迁的中国社会生活的反省和学术思考,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批判研究都会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研究生报:最后,张老师对于我们南大学子有什么寄语和希冀呢?

张老师:我之所以选择回到母校,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南大的学生在中国大学里是极其独特的。当然,这与我们深厚的文化学术传承、一代代老师的精心教化以及独特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关联,南大有今天的地位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觉得,南大学生最可贵的东西是对生活、学业、工作、生命的一种平实、从容的心态。当然,从地缘情境上看,我们既没有北京那种政治权力中心的诱惑,也没有上海那种国际化都市的物欲引力,平静地教学和学习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优点。但是,如果南大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中要建设一流的大学,那么创造性和坚韧的创新精神则是我们必须更加发扬光大的。南大希冀我们的同学中将来能出一些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但也要能够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要出国家和世界性的领袖人物。这正是我们这次“33制”教学改革的最深刻意义。因此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对于同学们来讲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保持我们平静和踏实的基础上,更多地去思考如何才能形成我们真正具有创造性的科学知识和人文精神。以文科来说,我们的思想史研究、我们的经典

文本研究是国内一流的,但是在方法论创新和原创性的学术积累方面却有待提高,所以,我们要向南大理科的学者学习,他们能够拿到“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的传统不能丢掉,它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要有民族的使命感,要有创造精神,这才是最重要的。

(原载《南京大学研究生报》第53期)

胡适明与新时期的思想解放 1

向死而生:以生命的涌流践行哲学之思

——纪念孙伯骥先生 8

悼念马克思 18

真问题的呈现是创新的逻辑入口 21

构筑科学平台,开创学术新视域 28

哲学是一种心

——国内哲学教学改革的一点思考 31

太阳与月亮的辩证法

——关于人学研究的一点思考 35

科学实践场与社会历史构境

——兼评皮克林的《实践的冲撞》 41

解构之雨: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之末路 62

关联与境:狄尔泰与他的历史哲学

——纪念狄尔泰逝世一百周年 69

目录 与新时期的思想解放 52

胡福明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52

向死而生:以生命的涌现践行哲学之思 111

——纪念孙伯鍈先生 111

神会马克思 18

真问题的呈现是创新的逻辑入口 21

构筑科学平台,开创学术新视域 24

哲学是一种思 210

——国内哲学教学改革的一点思考 210

太阳与月亮的辩证法 115

——关于人学研究的一点思考 115

科学实践场与社会历史构境 225

——兼评皮克林的《实践的冲撞》 225

解构之雨: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之末路 62

关联与境:狄尔泰与他的历史哲学 235

——纪念狄尔泰逝世一百周年 23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d11

回到海德格尔 92

海德格尔学术思想文本中的“怎样”(Wie) 107

海德格尔说海德格尔 131

探索海德格尔之路中的迷失和可能的光亮 175

作为发生事件(Ereignis)的生命体验

——关于青年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讲座的构境论解读 210

交道与实践:青年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的相遇 234

意蕴:遭遇世界中的上手与在手 255

从交往异化到雇佣劳动批判

——赫斯哲学补论 279

劳动与市民社会:黑格尔与古典经济学 300

马克思文本的再归基

——《回到马克思》第三版序言 307

附录一 关于齐泽克的访谈 323

附录二 对资本主义重新认识的突破与发展

——访南京大学张异宾教授 331

后 记 343

胡福明与新时期的思想解放

我们这一代理论工作者，其实是深受中国改革开放影响的一代，或者准确地说，是深受思想解放影响的一代。在一定的意义上，从教条主义体制下艰苦地挣脱出来的切肤之痛令我们深得思想解放之真谛。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同一性的教育就已在我们初始的心理建构中开始有意挤压独立的精神个性，“狠斗‘私’字一闪念”，以一种日常的神性仪式从我们的潜意识中逐渐铲除了自我意识，剩下的只有服从和遵循某种抽象道理的惯性运转。于是，我们变得只会说“对”、“是”，而被剥离了反叛和创造性的神经。这是一种历史性的悲剧。其实，就是在我们上大学的那个年代，这种僵化的思想构架仍然在整个教育体制和学术界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但是，相对于其他在“文革”之后最早进入研究生学习的年青学子，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学生应该说是特别幸运的，因为我们碰上了当时最好的一群老师。其中，就有对我一生学术思想影响至深的胡福明教授。

我曾经多次谈及这样一个心得，“像其它每一位当代中国青年理论工作者一样，我们的幸运都得益于今天的时代。然而使我更加有幸的是，能够直接得到胡福明教授和孙伯鍤教授的点拨：如果说胡老师给了我整个思想框架的开放前提，那么孙老师则赋予我理论建构的基本逻辑

和历史解析的构架。我能一直向前走,以至于将来或许能有些学术上的建树,大概永远得感谢这几位先生为我铺叠的每一块基石。我衷心感谢他们”^①。基于这一点,现在的年轻一代恐怕是无法体悟到那种从僵化体制中解放出来的思想自由感的。

在过去但并不久远的那个时代里,我们的理论学习环境,如果用一个不一定准确的比喻,是一个准神学的学习语境。这是因为,所有的学习个体都被无情地剥夺了思考的独立人格,我们无从选择地置身于一种强制的同一性之下。人们对所有的经典文献的态度就像虔诚的教徒面对《圣经》一样,不允许质疑,不允许发问,不允许争论,更不允许异议!这一教条主义的恶果即是,所有的中国人,特别是思想界,无一例外地丧失了独立的精神个性,而沦为传达同一种声音的传声筒(如果有例外,那必定会被残酷地消灭,如“文革”时期被杀害的遇罗锦和张志新)。于是,理论学术研究丧失了其真正意义,变成了根据政治要求编排语录的运作,马克思主义也可悲地成为了政策论证的工具(一个不无意义的讽刺就是,在“文革”中,所有的造反派,包括林彪和“四人帮”都能在特定的时段中找到需要的经典作家的语录观点,来论证他们反马克思主义的恶行。这在当时被称为革命的“语录战”)。

社会生活方面,在斯大林教条主义盛行以后的这么多年中,社会主义实践在不少重要的方面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加上良好的主体愿望),而没有从真实的客观现实(生产力水平)出发。理论观念(常常是经典作家的话语)决定现实,这可是真实发生的客观唯心主义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可悲的逻辑颠倒。^② 那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是:“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样,在那个年代中,我们主观上试图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而实际中却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最一般的原则:不是观念决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

① 张一兵:《西方人学第五代》,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后记。

② 在“文革”时期,中国的现实实践却是按照观念尺度——《人民日报》右上角的“最高指示”——发布栏运转的。

观念！人们似乎忘记了，现实永远不会因为人的主观愿望而改变。所以，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既不可能有真理，也不可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自然就成为一句空话。

当人没有独立的精神人格时，理论本身（哪怕它是自称唯物主义的）就以一种直接的总体同一性成为恐怖的思想禁锢。在这种同一性中，个体精神长期维持在一种低水平的愚昧状态之中，人们会在口头上大讲唯物主义，而同时践行着巨大的唯心主义感性冲动。1958年，当农民老大爷通过面前的石头现身说法地论说哲学唯物主义时，人们却在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蠢事；当70年代中期人们“认真弄懂”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献的时候，这也是“四人帮”形而上学最猖獗的时期。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及其著作一再被“油炸”、贩卖，变成了石化了的、僵死了的外在的东西！僵化的体制、僵化的生活导致了僵化的观念。人们——不仅是个人，也包括集体——的思想方式都是最典型和透彻的唯心史观！

尽管我们学习起始的时期，已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并且政治上的“反左”和拨乱反正已经开始。但这仅仅是政治表层的变化而已，人们深层的思想构架以及学习方式却仍维持着原有的方式，因袭着先前的逻辑惯性，没有本质上的变更。在“两个凡是”的阴影下，观念的方法论和思想的模型与“文革”结束前如出一辙。现实的运作方式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思维的新质并未出现，具有独立精神人格的个体也没有真正地产生。理论学习和学术研究中亦是如此。这可以以我自己的一个切身实例来进行说明。在我那一年（1979年）研究生的入学考试中，有一道试题是要求对赫拉克利特的“火”的观念作出评述。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居然在考试中一反教材中将其定义为简单的唯物主义层面上的物质实体的说法，而根据自己的理解，指认赫拉克利特在这一概念当中表达的是一种对事物以及现象背后的非直观的本质的追求，其实就是对“逻各斯”的渴望。从这一点上来说，它与柏拉图的“理念”是完全同质的。结果，我不但获得了“还不会走就想飞了”的评语，而且为此丢掉了

这一题全部的 25 分。谈到这一个例子并非是想为自己当时的想法正名,只是想借以说明在那一时期的教学以及考试模型中,仍然是不允许对被灌输的东西提出质疑的,因为知识的传递被视为一种绝对真理的传授,因而,这种带有“异端”性质的创造性思维不但被看作完全没有必要,甚至被认为是对经典的亵渎!

与当时整个中国思想方面的死寂不同,当时我们的老师胡福明教授(那时他还是一位讲师)在课堂教学中却显示了在当时看来颇令人感到震撼的开放性。如果我没有记错,胡老师给我们讲授列宁的《哲学笔记》,这也是在马列主义基本著作中难度最高的文本之一。可是,在胡老师的教学中,这一文本成了生动的思想画面(假如我没有记错,我正是由列宁的《哲学笔记》喜欢上了《逻辑学》,又由《逻辑学》迷上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上来,他就告诉我们,列宁是在十月革命即将开始的前夕突然研究黑格尔哲学的。但列宁对黑格尔的研究,并非是一种急用先学的功利主义,他几乎找到了当时能寻得的所有黑格尔的论著,其中包括《逻辑学》、《小逻辑》和《哲学史讲演录》等。整整九个月,列宁就是为了弄清楚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在讨论的唯物辩证法究竟是什么。这种能动的革命的唯物辩证法,对于一个落后的土地上进行社会革命意味着什么?显然,胡老师把《哲学笔记》的教授变成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成功结合的典范。当他讲到笔记的最后一个部分“实践与认识”(这也是列宁这一文本中最精彩的部分)时,他显得非常激动。他高声地说,今天我们的教学与宣传中非常(往往是重点)强调的哲学原理中的一些观念和原则,虽然往往是人们所熟知的,可是在现实中却常常是被违背和抛弃的。例如,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一再讲“现实决定观念,实践决定认识”,可在我们日常经验层面的生活中,却往往是革命导师、经典作家的指示、论断决定现实,从“文革”到当时莫不如是。胡老师认为,当时所谓的“两个凡是”的提法正是这一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政治层面的表现。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角度,深刻分析了列宁哲学思想的不断变化,进而提问道,随着实践的发展,有什么观念不会发

生变化、不会产生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它当然也要接受实践的历史检验。这一点，谁也不能例外！这一席话，在当时的特定语境中，真是惊世骇俗的话语。可想而知，这些话在我们那些还深陷传统教条构架中的青年学生来说会有多大的促动。回想起来，我们会常常在胡老师的课后激烈地争论，有时甚至会整夜整夜地不眠，一些问题有时会讨论好几个月。

我想，这也是胡老师后来之所以写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无异于平地春雷的划时代的文章的缘起吧。应该说，胡福明老师是有着极强的政治敏锐感的，他常常将对现实生活和社会政治的看法通过在课堂上讲授哲学观念的方式表达出来。而这样一种表达又恰恰不是以生拉硬拽的所谓“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获得的，它是首先建立在深入的基本理论研究基础之上，同时又会在直面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重大实践问题之上，以一种开放性的思维生发出来的。所以，我至今犹感甚为庆幸的是，正是在胡老师这种解放性思维方式的引导和启发下，我们那一届的研究生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反叛性和创造性。与今天的研究生教学中老师滔滔不绝地灌输、学生沉默地聆听记录不同，在我们的课堂上，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学生们无所顾忌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最后由老师作出总结。正是在这种气氛中，我们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学生，尤其是一个哲学系的学生所能获得的最好的习得。而这一点，也是在我们现在乃至将来的研究生培养中值得思考和借鉴的。

再回到胡老师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章的创作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这其实正是胡老师得之于对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基本原理深刻理解的一个必然结果。在不了解那个时代的人们看来，它也许远没有今天一些哗众取宠的话题那般为人津津乐道，但事实上，它在当时却无异于从整个思想界的沉寂中崛起的一声呐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完成之后，胡老师将其直接寄给了《光明日报》。在胡耀邦、杨西光等同志的领导和支持下，胡福明会同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的一些同志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进行了多次重